

罗念生全集

第五卷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

V



罗念生全集

第五卷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

V





编者说明

本卷收集的是罗念生先生翻译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446—约前 385）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家。他生活在雅典于希波战争胜利之后由极盛而转入衰落的时期。雅典在以自己为首的民主派和以斯巴达为首的贵族寡头派两派城邦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前 404）中被打败，从而导致雅典及整个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古希腊喜剧分为以政治讽刺为主的旧喜剧（公元前 488—前 5 世纪末），以谈论文学、哲学及社会问题为主的中期喜剧（公元前 4 世纪）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新喜剧（公元前 4 世纪后期至公元前 3 世纪中叶）三个发展阶段；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主要属于旧喜剧类型，晚期作品表现出向中期喜剧过渡的特征。阿里斯托芬怀念希波战争时期希腊的光荣；站在普通人民大众的立场，反对内战；反对政治蛊惑家，批评雅典民主制的衰败；反对富有阶层，主张财产平等。

阿里斯托芬一共创作了四十多部喜剧，有十一部完整传世。这里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六部剧本，即《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地母节妇女》和《蛙》，按古代演出年代的先后排列。

《阿卡奈人》根据罗泽斯（B. B. Rogers）编订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The Comedies of Aristophanes*, George Bell and Sons, London, 1910）第一卷第一部喜剧《阿卡奈人》（“Acharneis”）

希腊原文译出。

《骑士》根据罗泽斯（B. B. Rogers）编订的《阿里斯托芬的骑士》（*The Knights of Aristophanes*, George Bell and Sons, London, 1930）希腊原文译出。

《云》根据罗泽斯（B. B. Rogers）编订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The Comedies of Aristophanes*, George Bell and Sons, London, 1916）第二卷第一部喜剧《云》（“Nephelai”）和福尔曼（L. L. Forman）编订的《阿里斯托芬的云》（*Aristophanes: The Clouds*, The American Book Co., New York, 1915）希腊原文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以上三个剧本与周作人译《财神》、杨宪益译《鸟》合编为《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于1954年11月出版，今据此版本整理。罗念生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系统地论述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创作，这次编辑时把该序言放在本卷的前面，作为总序言。《云》一剧最初于1938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单独成书，署名“阿里斯托法涅斯原著，福尔曼编，罗念生译”。书中有译者序、编者的引言（节译）、原剧说明以及抄本版本与译本说明等，颇有参考价值，这次编辑时一并收入。

《马蜂》根据霍尔（F. W. Hall）和吉尔达特（W. M. Geldart）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Aristophanes Comoediae*, Oxford, 1954）希腊原文译出，并且参考了格雷夫斯（C. E. Graves）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马蜂》（*The Wasps of Aristophanes*, Cambridge, 1899）一书的注解。

《地母节妇女》根据罗杰斯（B. B. Rogers）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地母节妇女》（*The Thesmophoriazusae of Aristophanes*, George Bell and Sons, London, 1920）希腊原文译出。

《马蜂》和《地母节妇女》曾于1981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成《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出版，这次采用的便是这个译本，而罗先生为该书撰写的主要介绍这两部喜剧的译后记收入其



后，以供读者参考。

《蛙》根据霍尔（F. W. Hall）与吉尔达特（W. M. Geldart）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Aristophanes Comoediae*, Oxford, 1954）希腊原文译出。《蛙》原为节译，罗先生译出了第 830—1533 行，中间略有删略，发表于 1988 年 12 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一书。这次编辑时，该剧的删节部分由罗先生的孙女罗彤补译（包括第 830—1533 行间的删略部分）。

书中专名保持译本原有译法，以求尽可能保持译文原貌。译者对译文中的专名一般都附原文（采用的是拉丁字母转写或拉丁化写法），便于读者查对。卷末附有全卷专名索引。

《罗念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卷 目

喜 剧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

阿卡奈人

骑士

云

马蜂

地母节妇女

蛙

目 次

序·····	001
--------	-----

阿卡奈人

阿卡奈人·····	033
-----------	-----

骑 士

骑士·····	093
---------	-----

云

云·····	155
《云》1938年版材料·····	221
译者序·····	223
编者的引言（节译）·····	225
说明一·····	257
说明二·····	258



说明三	259
抄本版本与译本	260

马 蜂

马蜂	263
----------	-----

地母节妇女

地母节妇女	331
《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译后记	389

蛙

蛙	401
专名索引	477



序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最勇敢的和平战士，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四十年创作生活中，不断为雅典城邦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反对希腊民族的同室操戈，提倡泛希腊爱国主义；反对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主张温和的民主政策；反对政治煽动家愚弄人民，主张恢复雅典全盛时代的民主精神；他批判当日城市的腐败风俗、奢侈生活，歌颂辛勤的劳动人民和简朴的农村生活；他批判诡辩派的浮华教育，主张恢复马拉松时代的健全训练；他批判文坛上不重视教育意义的倾向，捍卫悲剧的崇高传统。此外，他还批判当日社会根深蒂固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提出严重的财产不平等問題。总之，他始终没有离开人民立场，没有脱离现实，他通过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当日的和平、民主而斗争。阿里斯托芬之所以永垂不朽，在于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光辉的尽了他的历史使命，而他的战斗精神则永远留给后世以鼓舞。



序

一 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

诗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邦日渐衰落的时代，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当此战乱和衰落时期，为人民的利益，为希腊民族的利益而反对内战，反对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诗人的光辉使命是永垂不朽的，可是关于诗人的生平，

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所有关于诗人的传说多半是猜测之辞，不甚可靠。至于比较可靠的事实就只能根据他的作品的内容来推断。阿里斯托芬在《云》的修改本里（第530—531行）说，他的第一部喜剧《宴会》演出时（公元前427年），他还是一个“处女”，不能够抚育这个“婴儿”，因此把她抛弃了，叫旁人去检来抚养。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根据这点说，那时候诗人还很年轻。据《苏联大百科全书》所载，诗人约生于公元前446年。

据说诗人籍属库达忒奈翁（Cydathenaion）区（在雅典城内），族名潘狄俄尼斯（Pandionis）。相传克勒翁曾经控告他是外邦人，不应享受雅典的公民权，这传说并不可靠。诗人曾经在《阿卡奈人》里（第652—653行）说，斯巴达人提出了和平建议，要求雅典人割让埃癸那，“他们并不是在乎那个海岛，无非要夺去这个诗人”。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一时的戏语来断定他是埃癸那人，来证明上面的传说。诗人的意思也许仅是暗指他本人分得过一块那岛上的土地罢了。^[1]

诗人的父亲名菲利波斯（Philippos），母亲名仄诺多拉（Zenodora）。他有三个儿子，他们名字叫菲利波斯（与祖父同名）、阿刺洛斯（Araros）、尼科斯刺托斯（Nicostratos）（或菲勒泰洛斯 Philetairos）。据说诗人最后两部喜剧，《科卡罗斯》（Cocalos）和《埃俄罗西孔》（Aiolosicon）（均已失传），是替阿刺洛斯写的，因为他想使他的儿子在喜剧上成名。他这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中期喜剧的作家。^[2]

诗人少年时代大概是生活在农村里，后来才移居于雅典。他的剧作都显出他对农事的熟悉、对劳动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敏感、对民间语言的熟练，可见农村生活曾留给他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创作上的人民性的根源。然而，在雅典，他无疑受过很好的教养，他对希腊文学与艺术就十分熟悉，那时正是雅典的全盛时



代，即所谓“伯里克利斯时代”（公元前444—前429年）。年轻的诗人就这样养成了对雅典民主精神的爱好，这种民主精神处处见于他的创作之中。

上文所提及的诗人的第一部喜剧《宴会》（仅存残诗）于公元前427年2月底的“勒奈亚”酒神节演出，剧中写旧派教育和新派教育的冲突。次年（公元前426年）诗人上演他的第二部喜剧《巴比伦人》（仅存残诗）。那次正逢“酒神大节”，有许多外邦使节到雅典来观剧，诗人便借这机会来揭露雅典人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他在剧中讥笑雅典盟邦及其使节的轻信和天真，他们受到雅典的权势人物和政治煽动家的欺骗。诗人针对着许多权势人物予以抨击，克勒翁也在内。这位当权人很生气，他控告诗人侮辱雅典公民和议员。诗人无疑受过审判，^[3]但是，由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容许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事情似乎并没有闹得很严重。诗人也许受过一点轻微的惩罚，此后他依然能够参加戏剧竞赛，而且他以后对克勒翁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据说他写过四十四部剧本，其中有四部，是否他的作品，在古代就发生了疑问。他的创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到如今只剩下十一部完整的罢了。

阿里斯托芬始终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会饮篇》（这篇对话里的时间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云》演出几年之后）里，提起阿里斯托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最初的人有两副脸，四手四足，后来被分为两半，成为一男一女，再由爱情使男女互相追求，结合为一。这种奇异的幻想和谈笑的风趣都是诗人所特有的。柏拉图很喜欢这位喜剧诗人，他并不因为《云》间接害死了苏格拉底而怨恨他。诗人约死于公元前385年，柏拉图曾经替他写过一首墓志铭：



序

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4]

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

今日所知的关于诗人生平事迹的资料，既贫乏，又不很可靠。好在最重要的并不是诗人的生平事迹，而是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和提供他的问题。

自从公元前 480 年雅典海军击败波斯侵略以后，雅典城邦便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它建立海上霸权，极力发展工商业，城市便日渐繁荣。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以高利贷及土地抵押方式出现），他方面由于海外粮食的大量输入，阿提刻农村经济便日渐衰落。这是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矛盾。

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雅典的社会阶级起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奴隶劳动的广泛使用、战时的投机事业、货币经济的发展等等，城市里出现了新兴的富豪（主要是作坊东主、商人及高利贷者）；他方面，由于艺工被奴隶劳动所排斥，农民因战争而流落城市，城市贫民人数激增，而且日益贫困化，这就造成贫民与富豪的矛盾。

就对外政策来说，自从得罗斯同盟成立以来（公元前 478 年），同盟的领导权就落在雅典人手上。雅典以上邦自居，不但向盟邦榨取经济的利益，而且干涉盟邦的内政。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以及雅典态度的骄横不免引起盟邦的不满，这种不满逐渐酝酿成为公开的叛变，如像那克索斯（Naxos）和塔索斯（Thasos）的叛变，这两起叛变都被雅典残酷的镇压下去了。往后，雅典压迫盟邦更甚，盟邦的地位就俨然如同附庸国。这是雅典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

雅典海上势力的强大，特别侵害到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经济利益，它不但霸占了爱琴海和黑海上的商业，还想垄断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交通，给伯罗奔尼撒同盟以莫大的威



胁；而斯巴达则时常企图瓦解以雅典为首的得罗斯同盟。这是雅典集团与斯巴达集团之间的矛盾。

在国内政治方面，自从伯里克利斯死后，民主党化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以地主为主，倾向于寡头政体，由尼喀阿斯领导；另一派以工商界富人为主，实行急进民主政策，由克勒翁领导。寡头党力图推翻当权的急进民主党，急进民主党则竭力压迫寡头党。这是国内党派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情况方面，当日诡辩学说风行，否定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提倡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以雄辩代替事实，以理论代替实践，引起教育和文坛上的不良倾向，而往日雅典全盛时代的旧传统却还具有相当势力，一般人民对于诡辩派的学说不满的。这是社会思想方面的矛盾。

雅典男权社会的传统是轻视妇女的，但是在战时妇女却是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生产者（瓶画上描写妇女生产的情景可以作证），诡辩派的兴起和影响使得妇女觉悟起来，思想和情感得到解放，从此妇女就开始挣扎，反抗（欧里庇得斯悲剧所描写的妇女心理可以作证）。这是男权与女权之间的矛盾。

无疑的，在古代奴隶制度之下，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基本矛盾之上，在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中，雅典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是时常浮现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要求息战还乡，而当局则竭力主战，这一矛盾表现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和平》、《吕西斯特刺忒》（*Lysistrata*）三剧中。《骑士》和《马蜂》揭露政治煽动家对人民的欺骗，《云》和《鸟》表现农民对城市生活及其文化的厌恶，至于反文坛新倾向则表现在《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zai*）和《蛙》两剧中。战后的主要矛盾是贫民与富豪的对抗，这表现在《公民大会妇女》^[5]和《财神》两剧中。

诗人对于这一连串的矛盾究竟采取什么立场、观点和态度



呢？诗人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早年他维护自耕农的利益；晚年他维护城市贫民的利益。在战时他主要反对内战，反对政治煽动家；在战后，他主要反对财产不平等，反对富人阶级。他竭力维护雅典民主盛世的旧传统（无论在文化教育方面或是文坛倾向方面），因而他反对诡辩派的浮华教育，反对悲剧的不重视道德意义。阿里斯托芬的态度是严肃的，虽然他是个喜剧作家，用诙谐的口吻来批判现实。

二 《阿卡奈人》

《阿卡奈人》于公元前 425 年演出。这剧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和平，反对内战。

内战是怎样发生的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矛盾。上文已经说过雅典海上势力的强大特别侵害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经济利益。斯巴达的盟邦埃癸那同雅典争夺海外市场，竟于公元前 456 年被雅典攻陷。科任托斯和墨伽拉也在同雅典争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市场，彼此间的经济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的矛盾。斯巴达时常想要破坏雅典的民主制度，瓦解得罗斯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诸盟邦庇护雅典的政治流亡人，而雅典则成为斯巴达的敌对分子的居留地，这就使得这两个集团的关系日益恶化。上述两种矛盾都是战争的主要原因。

雅典曾经和斯巴达集团于公元前 445 年缔结三十年和平协定，但是到了公元前 435 年以后的几年间，科任托斯和它的殖民地起了纠纷，雅典两次出面干涉，斯巴达集团便认为雅典破坏了和平协定，这是战争的主要导火线。科任托斯同雅典冲突，曾经得到墨伽拉的支持，雅典便借口墨伽拉人垦拓了雅典的圣林，于公元前 432 年颁布禁令，不许墨伽拉船只进入雅典和得罗斯同盟诸盟邦的各商港。^[6]这是战争的另一导火线。

战争于公元前 431 年爆发。斯巴达国王阿喀达摩斯首先率重



甲兵进袭阿提刻，驻军于阿卡奈。他竭力破坏这乡区，以为这样可以刺激阿卡奈人，使他们怂恿雅典人出城决战，但是伯里克里斯坚守不出，只令海军进袭伯罗奔尼撒沿岸，把整个半岛包围起来。同年秋，斯巴达兵退，次年再度侵袭阿提刻，蹂躏农村更为惨烈。雅典城内因为人口拥挤，街市不洁，于公元前430年发生大瘟疫，同时粮食缺乏，开始饥荒。公元前428年发生密提勒涅（Mytilene）城的叛变。这时候雅典的当权人是皮革商克勒翁。叛变平定后，克勒翁竭力主张严惩密提勒涅人，怂恿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把密提勒涅人，不论贵族党人或者民主党人，一律处死。次日大会重开，另作决定，只处死首要人物一千人。雅典的严厉政策于此可见。诗人在《阿卡奈人》第642行里指点出那些盟邦的人民是怎样受雅典的“民主”统治的，他的意思就是暗责这种上邦政策。

以上是内战的起因和战争初期的情况。

《阿卡奈人》的“开场”写一个主张与斯巴达人议和的农人狄开俄波利斯首先进场来等候公民大会开会。大会不让主和的阿菲忒俄斯讲话，竟把他赶走。狄开俄波利斯在气愤之下，便私自派阿菲忒俄斯去同斯巴达人议和。他议下了三十年海陆和约后，便带着他一家人举行乡村酒神节游行。

但是那些阿卡奈人（即剧中的歌队），因为他们的葡萄藤被敌人毁坏了，主张向斯巴达人报复，听说有人媾和，便出来反对，要惩罚狄开俄波利斯。狄开俄波利斯只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他们。于是他在讲话之前先向欧里庇得斯借来了一套破衣服穿在身上，以便取得那些阿卡奈人的同情。狄开俄波利斯在“对驳”场里对阿卡奈人说，他也恨斯巴达人，因为他自己的葡萄藤也被敌人割掉了，可是讲到战争的责任，却不能只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因为，当初原是伯里克里斯为了他的情妇所养着的妓女被墨伽拉人抢走，一怒而封锁墨伽拉的市场，墨伽



拉人不得已央求斯巴达人出来转圜设法，请雅典人撤消禁令。斯巴达人斡旋毫无结果，于是战争就爆发了。狄开俄波利斯这话只说服了半队歌队。另一半队便请出当时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支持他们。狄开俄波利斯向他们指出拉马科斯是一个只拿官俸而不肯卖命的人，战争只是对于那些主战派的军官才有好处，因此他们也就明白过来，不再反对和议。此后是“插曲”。歌队长这时候直接向观众说起诗人对城邦的贡献和他所起的教育作用。他说他曾经向雅典人指点出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他奉劝他们不要听信外邦人的阿谀，不要上他们的当。此后，狄开俄波利斯因为已经独自与斯巴达人订立了和约，便开放和平市场，于是有一个墨伽拉人为饥饿所迫，把他的两个小女儿当猪来卖给狄开俄波利斯。此后进场的是一个玻俄提亚人，他很富有，也带着许多鸟兽来卖给他。后来狄开俄波利斯准备赴“大酒钟节”宴会，拉马科斯却准备去守关口。在“退场”里，狄开俄波利斯赴宴归来，喝得醉醺醺的同两个吹笛女取乐；拉马科斯却自战场上受伤回来，叫苦连天。

《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首先在于扫除民众中的主战心理。当日主战派的人数很占优势，包括全体工商业界和一部分乡下人（如像本剧里的阿卡奈人）在内。工商业界受了政治煽动家的鼓动和挑拨，竭力主战，想藉战争来维护和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至于一部分乡下人则是因为受到战争的损失，竭力主张向斯巴达人报复。诗人用阿卡奈人来代表主战派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阿卡奈人自来就英勇好战，^[7] 他们的乡区于内战爆发时竟出动了三千名重甲兵，这是一个颇不小的数字。他们看见敌人驻在他们的家乡，看见家园被毁，葡萄藤被拔掉，他们更痛恨斯巴达人，很想出城一战。^[8] 诗人借狄开俄波利斯的口来说明战争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斯巴达人身上，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第三场）。那些代表主战派的阿卡奈人一旦明白了，他们的心理立刻



就完全改变了。诗人就这样扫除主战的心理。

本剧的第二个政治作用是指希腊民族的同室操戈是非正义的战争。内战期中以墨伽拉人所受的祸害最为惨重。战争的第一年伯里克利斯就亲自统率一万三千重甲兵、一百只战舰进攻墨伽拉，尽毁了墨伽拉人的农作物，使得他们无以为生。雅典人还通过一条法案，规定对墨伽拉永不讲和，并且要杀掉阿提刻境内所有的墨伽拉人。雅典的将军于就职的时候要发誓每年攻打墨伽拉两次。雅典人攻打墨伽拉另有作用。他们在军事上处处失利，想重振军威，又不敢北上犯玻俄提亚，只好拿这弱小可欺的墨伽拉来出出气。诗人借墨伽拉人卖猪一景（第四场）来表明战争的残酷，这一景表面上很滑稽，骨子里是很凄惨的。至于没有十分受到战争的祸害的玻俄提亚人却还过着富裕的生活。

本剧的第三个政治作用是把和平与战争作为对比，令人知所选择。狄开俄波利斯准备去赴“大酒钟节”宴会和拉马科斯准备去守关口一景（第六场）是和平与战争的鲜明对比，这一景是很著名的。诗人在“第二合唱歌”里描写和平的美丽与战争的凶恶，这也是一个对比。至于狄开俄波利斯庆祝乡村酒神节一景（进场）则给观众以和平的远景。诗人用这种形象化的手法来描写和平与战争，这几个画面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诗人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帝国政策所招致的后果，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内讧，是非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满足了政治煽动家（如像克勒翁之流）的野心，满足了工商界富人的贪欲，满足了好战的将领（如像拉马科斯之流）的虚荣，却给城邦带来莫大的损失，给农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所以诗人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坚决加以反对。他主张希腊各城邦互相友好，互相通商，共同准备再对付波斯人的侵略，而不是互派使节去向波斯国王求援乞助，以致中了这真正的敌人的毒计。

